

China Literary Criticism 2007-2008

郜元宝 编选

2007-2008 中国文学评论双年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程德培 ◇ 甜蜜的“怀疑论者”

——金仁顺的七个短篇

阎晶明 ◇ 金仁顺近期小说解读

申霞艳 ◇ 罪、真相及救赎

——谈北村的神性写作

刘再复 ◇ 中国出了部奇书

——读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

汪涌豪 ◇ 今天诗人该怎样安顿自己

杨克 ◇ 中国诗歌现场

——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证分析

李振声 ◇ 王小妮读札

洪治纲 ◇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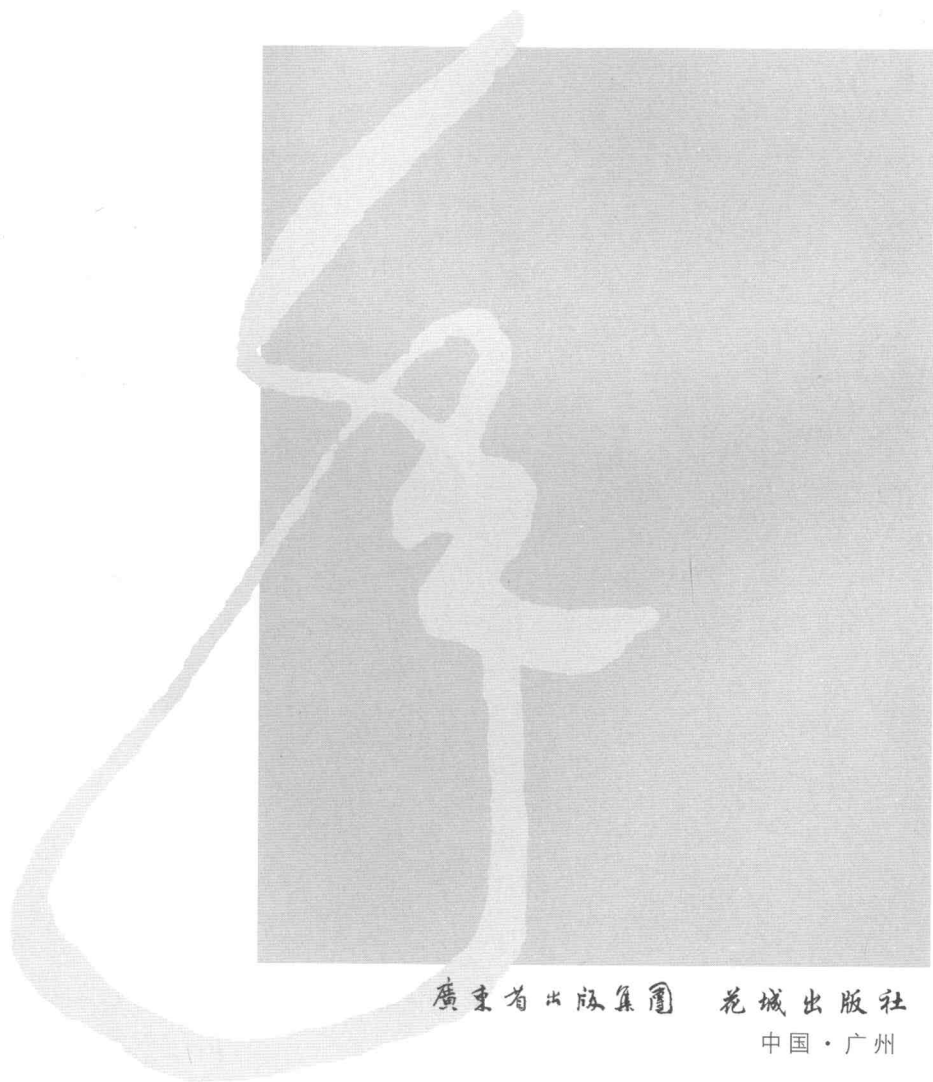
朱大可 ◇ 文学的终结和蝶化



China Literary Criticism 2007-2008

郜元宝 编选

2007-2008 中国文学评论双年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2008 中国文学评论双年选 / 郜元宝选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5595-7

I. 2… II. 郜…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8941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衡

林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5 1 插页

字 数 42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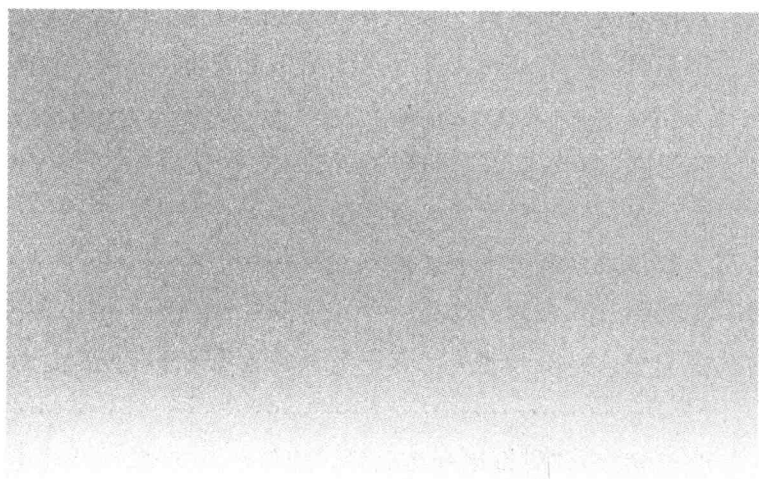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2008

中国文学评论双年选



目录

郜元宝 ◇ 序	1
---------------	---

一、小说与小说家论

程德培 ◇ 甜蜜的“怀疑论者”——金仁顺的七个短篇	3
阎晶明 ◇ 金仁顺近期小说解读	8
申霞艳 ◇ 罪、真相及救赎——谈北村的神性写作	11
刘再复 ◇ 中国出了部奇书——读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 ...	19
邵燕君 ◇ 荒诞还是荒唐，读圣还是褻渎？——由阎连科《风雅颂》评某种不良的写作倾向	23
陈思和 ◇ 人畜混杂阴阳并存——读《生死疲劳》	39
张 念 ◇ 性别迷宫里的色情叙事	51
孟繁华 ◇ 葛水平小说论	62
王彬彬 ◇ 孙犁的意义	67
郜元宝 ◇ 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	83
张新颖 ◇ “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沈从文在1950—1951年	102
李建军 ◇ 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	113
毕星星 ◇ 毁誉参半说浩然	121
程光炜 ◇ 我们这代人的文学教育——由此想到小说家浩然 ...	126

二、诗与散文的事

汪涌濂 ◇ 今天，诗人该怎样安顿自己	133
杨 克 ◇ 中国诗歌现场——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证分析 ...	136

朱寿桐 ◇ 中生代诗人的群体焦虑与诗性自觉	141
李振声 ◇ 王小妮读札	150
陈 超 ◇ 从“纯于一”到“杂于一”——论西川晚近诗歌	164
冯锡刚 ◇ 康生与毛泽东诗词	177
王 尧 ◇ 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	184
王兆胜 ◇ 平衡感·平常心·平淡美——谈散文写作的难度	188
孙 郁 ◇ 小人物与大哲学	193

三、文学现象综论

王 干 ◇ 文学的界面在延伸——论新世纪文学兼驳文学边缘论	201
洪治纲 ◇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	205
朱大可 ◇ 文学的终结和蝶化	216
贺仲明 ◇ 当前中国文学到底缺什么？——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个案	221
吴 俊 ◇ 另一种权利割据：当代文学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研究	229
黄惟群 ◇ 中国当代文学鼎盛期再望	240

四、批评的批评

孟繁华 ◇ 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	255
吴义勤 ◇ 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62
朱小如 贾梦玮 ◇ 由“创作局限论”引出的问题	274
阎 嘉 ◇ 迷离的理论，浮夸的文风——评金惠敏《媒介的后果 ——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	282
王彬彬 ◇ 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 实践》中的问题意识	293
谭运长 ◇ 海外偶像崇拜：中国学术的迷障	304

序

郜元宝

郜
元
宝
·
序

这本 2007 - 2008 中国文学批评双年选在编辑方法和取舍标准上和上两年并无什么两样，不必再说什么。2005 - 2006 双年选的编者序对入选各篇都有评点，事后颇悔之，因为文章俱在，读者自有评价，何必饶舌呢？今年的序，我想干脆抛开具体文章，对“中国批评”本身谈点看法。

三四十年代，当时中国最好的批评家之一胡风曾说，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学在中国新拓的一个支流。胡风是想把中国文学（包括批评）汇入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批评）大家族，反对将中国文学与世界进步文学隔绝，在理解中国文学特殊性的同时警惕着中国文学的自我封闭。

但实践（包括胡风自己的命运）证明，他的估计太乐观了。和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等学院派批评家相比，亲身参与文学运动甚至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卷入文学论争和人事纠葛的胡风，算是相当能够顾及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环境了，饶是如此，他在竭力论证中国文学世界性普遍价值的同时还是未能充分理解中国文学与中国批评的中国特性，至少没把这个问题强调地提出来作为中国批评首须面对的，而只是作为很快就要被超越的暂时性问题附带提及。胡风现实主义理论固然要抗拒那强行嵌入的普遍性，强调抗战时期中国

文学因地域关系和新旧两种传统渊源所形成的特殊性，但他最终目标乃是要取得自己对中国文学普遍性的权威解释，他为中国文学所设计的“现实主义的路”未免理想化，中国文学和批评的现实环境终于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想碾得粉碎。

当代文学与胡风所面对的新文学很不相同。和政治经济开放态势形成鲜明对照，现代中国文坛那种向世界文学看齐的倾向与冲动（陈思和先生称之为“中国新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在当代文学中已日渐稀薄（除非把难以舍弃的诺贝尔奖情结也算作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正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性所致。可惜批评家们不愿直面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性，故意无视这种特殊性，甚至满足于这种特殊性，从这种特殊性中寻找良好的自我感觉。

要想进入世界文学和世界性文学批评的总体格局，必须先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批评的特殊性。不正视特殊性，容易为故意回避的特殊性所俘虏，距离一厢情愿地追求的普遍性更遥远。研究和呼唤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性，首须正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性（特殊的环境、资源和因此养成的品行），这是我提出“中国批评”的一个现实的考虑。

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性有很多值得反省的现象，往往是好谈高级理论的人士不喜欢谈论的（虽然整天就生活于其中），因为这些现象在外观上委实太不高级，也太不雅观了。

比如许多批评家见到稍微有权势的作家就不敢说话，更谈不上“说真话”。而许多批评家一旦和作家混熟，成了朋友，无论这些作家有无权势，都无法再诚实放松地展开批评。这种现象就颇能见出中国批评的特点或曰中国批评的“中国性”。

又比如在面对并不太多的金钱时会出现“失语症”。这虽然谈不上中国批评的特性，却也是经常出现而常遭物议的现象。

在面对某些自己还并不熟悉的欧美簇新理论话语时，如同在面对欧美思想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的权威乃至在欧美大学工作的华裔学者时，中国批评也会严重“失语”——这后一点是老中青三代批评家共同的弱点，绝对属于当代中国批评的一种特性。

应该承认，中国批评还没有足够的精神资源帮助自己学会洞悉权势者的权柄必要败亡的本质，也没有足够的精神资源帮助自己洞悉流行话语和世间流行的智慧包括所谓江湖感情哥们义气所包含的权势必要败亡的本质，正如同样没有足够的精神资源帮助中国批评洞悉这世上的财富与金钱的权势必要败亡的本质。既无法洞悉，当然要反过来为其所辖制。批评匍匐于有形无形的权势之下，难以冲决网罗，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更看不到批评活动所蕴含的马修·阿诺德所谓“光明与美好”，也就很正常了。

批评的目标既然不是洞悉并批评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势压抑精神自由的真相，势必反其道而行之，企图借助可怜的边缘化的批评文字获取自己所不能洞悉的权威，分享这种权威所发出的世间荣耀的光环。这比不敢说真话更可悲，

因为批评家们竟然像可怜的包法利夫人那样追求他们本来有责任洞悉和弃绝的必要败亡的荣耀，并用所追求的世间荣耀的绳索来捆绑精神的自由。

最近读到《知堂回忆录》中一段话颇受震动。晚年知堂说自己写了几本关于鲁迅的书，终于“对得起”大哥了。但他又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对比“五四”时期作为权威指导者的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把人高举到“如神”的地位，说人自己就是值得崇拜的神，六十年代这番话在坚定的人道主义者看来就未免太过丧气了，好像走了一个圆圈。知堂当然并不想回到提倡“人的文学”之前尚不知有“人”的中国文学的传统，他只是想对人而且只有人的文学做点必要的反思，是人的文学的进深化，即看到人的力量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力量的限度，或者说人本身的限度。

忘记限度，人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堕落，甚至要加以美化，终于连最明显的堕落也视而不见。当代批评在高贵的人道主义理想中复活，却一路下行到放弃批评的起码原则，还要寻出许多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用许多不相干的说辞做障眼法，这虽然令人难以接受，却正是“五四”以来那种“只有人”的狭隘哲学导致的结果。在存在的平面上只有人，人就被异化，成为自己顶礼膜拜的偶像。单知道人会膜拜神祇，殊不知人更容易膜拜的还是自己和同类。“人的力量”不能完全解放人自己，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人明知自己有某种力量却甘愿匍匐于同类脚下，和同类一起制造某些价值标准然后加以膜拜。批评原来是要解放人，结果被解放了的人以及人的各种价值又反过来窒息批评，因为他要批评为他服务做他的奴隶。现在的中国批评不正高高兴兴做着人五人六的奴隶吗？

现代文学史上确实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和重要的思想线索没有很好地清理，更没有很好地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延续下来，这其中就包括晚年周作人的启悟。其实这点启悟，这点对人的力量的反省，周作人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有了，但晚年说来，更有点让人觉得透心凉，或许也更能引起后人的省思罢。

中国批评的上述特性和中国批评所承续的最近的精神谱系有关，是中国批评的历史问题。既然是历史问题，沉浸于当下文学现场的批评就很容易忽视。很多批评家谰言历史，把历史（包括自身的历史）当作批评工作的一个不该负担的重荷。他们满足于谈论最新出现的文本，满足于捕捉最新成名的作家，满足于操练有可能适合于这些作家作品的各种有势力的新话语新理论。八十年代以来，“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文论介入中国批评界，固然增强了中国批评一点可疑的形式意识，但也丧失了必要的历史感。

今日中国批评不仅对自身的历史渊源很隔膜，对所批评的对象即今日中国作家的实际生态与心态也很陌生。这是中国批评缺乏历史意识的另一面。本来，作家是批评文化解剖社会的很好中介，但现在批评家虽然可以和作家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做酒肉朋友，一旦进入批评，马上就好像变得根本不认识作家，一概杜绝作家的任何信息，似乎非此不足以保证批评的公正性、客观性、

理论性和超越性。殊不知仅仅谈论文本，恰恰是批评丢失公正性、客观性和深刻性的表现。中国批评最触目的怪现状就是批评家们只谈架空的文学，不谈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一大堆批评家围着一个作家七嘴八舌展开批评，只是众口一词大肆表扬。当面确实没法批评，骂，怕伤了“和气”；捧，又怕对方不满意，还要遭到人耻笑。

我们已经丧失了优雅地跟活人打交道的说话艺术。作家有没有雅量接受批评家的批评是一回事，批评家倘没有推开一切顾忌单凭一颗赤子之心而和作家的灵魂真诚热烈地拥抱，仅仅满足于对作家作品进行所谓冷静客观的分析，不仅无法抵达当代文学的核心，也会把作家们拖离这个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正在展开的当代历史。批评家正是通过自己和作家灵魂深处的对话进入历史。从美国或别的国家拿来现代性或后现代概念，是无法进入自己的历史的。

为规避历史，中国批评另一惯技就是聪明伶俐地打时间差。比如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很多人还不会开车，更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有因特网，却在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大谈特谈后现代；如今却怪了，很多后现代现象明明已经出现，就在身边，我们甚至都已经丧失了对真实和虚假的区分的判断力，历史的吊诡无情地冲刷着基本的道德底线，在这种典型的“后现代文化场域”，刚才还大谈后现代的人反而去赶另一种学术时髦而大谈“现代性”了。谁搞得清“现代性”这三个比宇宙略小比地球还大的汉字？好像在现代性理论出现之前，一切曾有的知识都要作废，以后也不会再产生与现代性无关的新理论和新名词了。这可真是扯淡啊。也许唯一值得研究的，不是空无所指的“现代性”理论，而是在我们这里竟然会有那么多聪明人整天围着“现代性”三个字兴致勃勃进行谈论的怪现象本身。

另一个有趣的时间差是在传统文学批评几乎被政治彻底驱逐出公共领域之后，很多批评家反而突然假装自己非常具有政治睿智和政治热情，大搞政治影射式或政策模拟式（献策式）文化批评。

打时间差的批评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用这个典故字面上的意思，即只要自己不被烫着，只要足够安全，就可以尽情表演类似烧开水或炒菜煮饭的批评艺术了。

因为只谈架空的宏大历史概念，只谈孤立的文本，不谈现实，所以我们日渐丧失了对现实的新鲜的感受与想象。有人说我们对文学没有想象力，是因为我们对现实本身没有想象力，这没错。重要的不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进步了多少，获得了多少，而是这么多年来我们退步了多少，丧失了多少。我们发现丧失最多的是对现实的感受。味觉退化，听觉退化，内心的味觉和听觉也退化了。虽然有许多人敢于批评中国现代批评，敢于板起面孔来批评钱玄同，批评周作人，批评周扬，批评胡风，批评李长之、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甚至批评鲁迅。但回头想一想，现代批评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针对活人，抓住活人，批评活动散发着一股活人的气息，而非“死的说教”。这种应该继承下

来的传统，似乎已经失传。

还有一点也许很小但或许正是中国批评的大问题：许多人扎堆说话，却很少懂得引经据典的说话艺术。胡适讲新文学不用典，仿佛也影响到批评家。不用典的批评使很多问题被取消历史纵深，压缩到某个正在流行的理论话语平面，批评活动由此变得超薄超乏味。今天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似乎天生就是敌人；同一个人，做批评家就不能做文学史家，做文学史家就不能做批评家。不错，批评家批评文学史家不懂文学，往往是有理由的。但如果这种批评的结果是批评家自己放弃对文学史的形象与研究，满足于研究孤立无援的当下文学现场，他的命运也很可悲；在不远的将来，这种单薄的批评被文学史研究所取代，也是很自然的事。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批评已经“文学史化”了，已经蜕变为呼吸不通于今的僵化的文学史叙述。但这不是文学史学科过于强悍所致，相反乃是批评家的文学史想象（包括文学史知识）过于薄弱的结果。

另外，很多人谈文学，谈技巧，就是不谈文字，批评文章也不在乎区区文字小节。这恐怕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理解并掌握的汉字越来越少，记得这些汉字包含的典故也越来越少。章太炎曾批评新文学家“识字不多”，只晓得叫嚷言文合一，“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做造”，失却中国文化的本根。这种国粹主义的汉字观后来遭到鲁迅等新文化主将抨击也是应该，但观乎当下批评，能用唐宋文人所造的成语作文，能用小说演义所存文法造句，已经难能可贵，再看章太炎的怪论，反而要令我们惕然自惧。中国文学批评对汉字没感觉，对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当然也不会有感觉。

说了一大堆“中国批评”的坏话，满口柴胡，无非想呼吁中国批评界在展开批评的同时不妨也尝试真诚地、深入地反省一下自身。批评的灵魂和生命一刻也不能离开对自我的批评。

2008年11月24日

一、小说与小说家论

甜蜜的“怀疑论者”

——金仁顺的七个短篇

程德培

金仁顺的短篇不说摄魄，但总有勾魂的魅力。几年时间，七个短篇外加一篇议论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的短文。这是我所能寻找到的文字。相比这些年小说界又长又滥的姿态，金仁顺无疑是一种逆向的行驶。这方面，产品的质量终于和资本脱离了原本难以摆脱的瓜葛。时间之于金仁顺的写作，占着如何的比例，是主项还是业余中的业余，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不管怎样，能做到又短又少又好这一点实属不易。金仁顺的短篇之所以写得好，全在于那心思缜密的叙述思维，不止是懂得该说什么，什么不该说，更重要是她懂得省略和删除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叙述和表达。

金仁顺的小说似乎也不怎么广阔，就机械复制而论，无非是饮食加男女，喝咖啡是他或她经常去的地方。《桔梗谣》写的是忠赫、春吉和秀茶之间以往农村生活的情爱往事，《霰雪》写的是廉建军和周晓南作为高中同学的一次聚会、一阵回首。喝咖啡依然不能省略，不同的是前者出现在开篇，后者则出现在结尾。《桃花》的篇幅更长些，事情进展也更曲折，于是饮食便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夏蕙和母亲季莲心的关系因父亲老夏意外逝世而变得陌生。但往来依旧，“没有演出看的日子，季莲心带着夏蕙去喝咖啡。她总能找到新开的咖啡馆。有五星级的咖啡馆，有会员俱乐部，也有几次是在小巷里头，开车左弯右绕地折腾了半天，最后在黑暗中看到一串闪耀的霓虹灯，廉价的彩色珠子似的，在夜色里欢快地跳跃着。”喝咖啡成了小说中人与人产生联系的不可或缺的场所。很容易使我们这样的读者联想起，那过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地下交通站和联络点。

饮食是生活之必需，男女自然也是生活之日常。金仁顺似乎坚定地向男男女女倾斜，向日常生活中庸常的一面致敬，但又能以过人的胆识悄悄地对它们进行改写，从诉说饮食男女那最不经意的疏漏中找寻意义，而人们津津乐道的爱情意义之中她使用否决权，摒弃那先入为主的关于幸福的预设。她那种对细节细致入微的解读的另一面包藏着一种普遍的“怀疑论”。怀疑与肯定拉开距离，但与否定又不站在同一立场，怀疑是一种不信任，一种质询，一种对缺口的寻觅，是一次远离其曾经信任过的目的地的旅程。工于心计，擅长玩弄的安次、最终让赵莲的身体实实在在进入臂弯，但“心却空落落的”（《爱情诗》）；那

不屑于世俗最终被世俗所算计的夏蕙（《桃花》）；还有那闲散的梦想与一个虚荣的世界彼此游戏，又是如何走向自我戏仿的陷阱（《云雀》）。没有最好的结果，也没有最坏的结果，有的是没有结果。男人女人都走在路上，相对东西南北，顺行与逆行都是同时的存在。关于男女之关系，我们总能从其布局，令人失望遗憾的结局中找出其怀疑的目光。对金仁顺来说，怀疑是爱情、理想婚姻的解毒剂，心存爱意，但圆满的实现总在遥远的别处。

说是从疏漏中收拾点意义，其实能有多少意义。九十年代始，文学仿佛在一瞬间被突然剥夺了意义，转向娱乐性成了疏离意义的手段。有一种说法，将意义太多和意义太少分别命为天使和魔性。天使过分填充意义，对意义的态度过于严肃认真，魔性反其道而行之，对意义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倾覆进入虚无主义。弗洛伊德认为，无意义处在意义的根部。这实际是一条线，这是一条我们每次张嘴都会跨过的线。创作心存怀疑，疏离意义，而批评则对漂浮的能指施以一往情深的追逐。天使与魔性成了彼此的需求。创作不屑于批评，和批评对创作心存失望，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

金仁顺的小说有着短篇艺术的节制与和谐之美，但其文本所散发的意义之声却不总是和谐的。得到的却空落落的，好不容易出走最后又一次回到原地，经历曲折的再次婚姻却又是前次婚姻的重复……不错，也有和谐之音的尾声，比如《仿佛依稀》，比如《桔梗谣》，但那是经过漫长的对抗、分离、抵触之后抵达的和谐之地，其和谐之音也是以谅解、原谅、怜悯、同情来作为交换之物的。他告诉我们的无非也只是“最好呆在原处的信念”。彼此都认可了不和谐的现状，以内在性的付出以达到某种妥协，以换取和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损伤怀疑论的精神作为代价。最终的和谐、理解、彼此的呼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暂时中断怀疑的进程。

除了这些牺牲之外，金仁顺的小说更多的是植根于“怀疑论的土壤”。怀疑始终是它固执的母题。与其说是理想之爱的失落，还不如说他从未出现过。怀疑或许是一种破坏性的进取，或许也是面对自我的一种迷失，或许更是一种对曾经拥有的迷恋产生了不信任。金仁顺的笔墨注重经营的是关系学，而且很多时候做的都是男人女人的单项营生。《云雀》可以看作《玩偶之家》的当代生活版。它改写的地方在于，出走往往意味着更可怕的“回家”，家的意义和出走的意义同时出现在意料之外的变更。身处笼中，没想到走出笼外便进入了一个更大的陷阱。这里没有谴责，也没有意义上的出路。当然，带着某种自责回到原地也是一种出路，甚至没有出路也是一种小说意味上的出路。金仁顺的小说都是对人们早已习惯了的，或阅读期待早已轻车熟路的那套圆满之情持有一种怀疑的立场，那温情脉脉的有色之镜被掀掉了幻觉的面纱，露出的裂缝塞进了问号，如同“爱情诗”的结尾处：“安次轻轻把赵莲从怀里推开，转过身，把花洒插回到墙上那个酷似半个手铐的卡子里。”真实情境，行为动作，寓意象征，微风拂面似的反讽、嘲弄都堵塞在一个窄门之口，让人欲吐为快，却又口难言。这很像其同时期的作家叶弥的《马德里的白衬衫》中马德里那一开

始的心情：“他长长吸了一口气，仿佛是惆怅的，又是欣喜的，心里装着的幸福好像是满满的，一转念又空了。”

根据拉康的观点，女人是男人的症状。事实上男人又何尝不是女人的症状？人都是他人的症状。对金仁顺来说，他人未必是地狱。但也有例外，夏蕙这样一位表面上极其傲慢，多少有点冷漠，而实际掩盖着其无法摆脱的自卑。她多少有点恋父的情绪，因父亲过早地因车祸而去，在母亲季莲心的身上发生了情绪性的颠覆。结果《桃花》演绎的是一场母女间的对抗，两个女性间为争夺第三者的心理之战。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因莫名而无法扫除的嫉妒之心引发妄想症的故事。这是故事也是精神分析的一个案例。此故事叙述的跌宕起伏、波澜不断，日常生活因心理变故而变得不同寻常，以至最后那浓墨重彩的凶兆也有点不像金仁顺所为。如果说《桃花》通过反衬，如影随形般的手法道出女儿对父亲的情感，那么《仿佛依稀》则是一场直面的叙述了。早熟善良懂事脾气倔的新容和清高儒雅从容脱俗的父亲苏启智的情感故事。从小新容就崇拜信任父亲，“为他是她的父亲自豪”。后因父亲的婚外恋而伤了父女间的感情，更因父亲和母亲黄励离婚，娶了学生辈的徐文静后而中断了父女间的来往。这是一次创伤性遭遇，改变了这新旧家庭中每个人的生活。不过，这些经历和故事在小说中都成了断断续续的插入和不时涌入心头的记忆。小说的现在时态却是因为父亲得了晚期胃癌，父女间的重逢。一头是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一头是裂缝得到修复，父女间的情感又回到了起点。《仿佛依稀》在《作家》杂志上发表时被列为不常见说的“小中篇”，我似乎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此一段时间的作者是否有着长篇的作业在进行？一个写短篇的高手，猛然进入长篇的叙事思维，这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

还是拉康关于爱情的说法：“爱情表现出来时很少是真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爱情只会维持一段时间。”婚姻如果指的是家庭契约的话，那么爱情则经常表现为解除契约的危险。爱情这种最为理想的情感方式在现实生活往往又是以相当脆弱之物开始的。《彼此》作为短篇佳作，无疑是2007年短篇艺术的代表作。我有点不敢相信，在短篇这种文学样式不断衰败的岁月里，竟然还会有这样的精心之作出现。《彼此》故事很简单，作为医生的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家庭，“丈夫有外遇了，或者自己有外遇了；不再相信爱情，或者开始相信爱情”。一个文静、优雅的女人，女人中间的另类，寡言少语的“大理石美人”黎亚非，让四十五岁的主刀大夫周祥生再次演绎了关于爱情不信任中获取了信任的故事。爱情无疑是存在的，但通往爱情的道路经常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必须聆听一个个反讽的故事，内容是爱情如何产生出其反面，如何在过程中包括曲折、分歧、无谓的尝试、没有余地的死胡同。我们似乎只有在检讨这个过去，才能最终认识到爱情在不知不觉被遗漏了。“女人是玫瑰，漂亮的花朵，还有那些刺——千万别忘记那些刺”，《彼此》中周祥生那颇有男子沙文主义的想法，自然令我们想起弗洛伊德那具有同样性质的格言：“女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是永恒麻烦的源泉，但她们依然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一种类中最好的

事物，没有她们情形会更糟。”金仁顺将无谓的尝试写得那么有滋有味，把甜蜜的瞬间写得那么令人神往，而那周而复始的死胡同，连同那周祥生和黎亚非的再次新婚却写得冰凉冰凉的。不露声色的恰似轻捻流畅的叙述和难以随意的重负，多少让有点窒息的结尾都成了彼此的镜像。冷酷是这一代诸多优秀作家的特征，单一个冷酷的问题就简单了，麻烦在于冷酷还包裹着诸多与冷酷并不兼容的东西，对甜蜜的回忆多少是对甜蜜存在的证明，但对甜蜜的怀疑则是甜蜜另一种存在的推论。鉴于爱情只有借助失去自我的线索才能显现自我的面目，为了回归这一理想的自我而落入“怀疑论”的世俗土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这多少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构。

事实上并不是情感生活和话题只和理想和圆满有关，它完全可能存活于另一种艺术谱系，庸常与妥协、简单与消耗、疑惑与宿命。毕竟，小说仅仅是虚构，它所被准予运用代理的权力都是我们可以容忍的。我们自己在实在世界遭遇所受的压抑，在这并不实在的世界中或许会得到巧妙的缓和与舒展，或许这是无奈和必需的并存。我们在审美领域得以一瞥的东西并非惊世骇俗的新天地，有时恰恰是与我们熟视无睹的现世生活的重逢与巧遇。世俗的甜蜜并不那么生离死别，并不那么理想，但却必须是我们大多数人能够触摸的、能够企及的情感加以接受。虽然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琐屑，其周而复始的圆圈在更高层面的认知上同样遭致另一种怀疑论，那生活在其中的男人女人还是不能公然放弃这个世界。那么文学呢，放弃这样的世界成就一种理想主义，还是紧追不舍而成就一种现实主义。金仁顺大部分属于后者。值得庆幸的是，她还有“怀疑论”，多少夹带着前者的剩余之物。《云雀》是值得商榷的。它究竟是指涉一个包着二奶无可奈何的终极命运，还是隐语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在一个拥有稳定社会地位和富裕物质生活的中年男子的怀抱中会获取更多的利益呢？是否作者还想走第三条路，揭示出甜蜜生活那温情面纱下的残酷和无奈，故事整个就是反讽？也许，作者什么想法都没有，她只是叙述一个多少有点意味的状态，仅此而已，所有这些歧义都是那些坐在安乐椅上，无事可做的批评家们的想入非非。同样，《彼此》是可以质疑的。倘若说金仁顺惯于在甜蜜的俗世中进行叙事旅程的话，那个两次婚前所出现偶尔性“告密性”的举报，作为一种多少有点宿命的破坏性符号的插入却是非世俗和日常的。郑昊前女友得意洋洋的告密性叙说和周祥生无法诉说、默默等候的那备受煎熬的一整夜无疑都是有目的精心布置，这些小玩意犹如定时炸弹令人忐忑不安，令剧中甜蜜幸福之人顷刻性进入他途，也令剧外人在阅读现场领受一张红牌一样被逐出场外。宿命般的惩戒这样一张王牌究竟归属于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中，不同的人可以各取所需。但是，这种“精心”作为这篇优秀之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同时，多少也露出了和金仁顺惯于经营的甜蜜世界难以弥补的裂缝。爱确实是一种疾病，它是我们本能中最邪乎、最不稳定、最容易出错，而且其神圣与亵渎方面如同精神与物质一样不可区分。相反，从某种身心的角度解读，疾病可能是经过转化的爱，作为一种可以辨认的症候，是否经常性地表现为这同一类型的裂缝